

J - A N A N D - P - I N G Z H U A N

● 李文祿 著

沈阳出版社

建安七子評傳



建安七子评传

李文禄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安七子评传/李文禄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0.12

ISBN 7-5441-1500-3

I . 建… II . 李… III . 建安七子—文学研究
IV . I20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230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张：9 插页：1

印数：1—3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曹福志

责任校对：夫 子

封面设计：庄庆芳

版式设计：理 文

定价：16.60 元

目 录

建安七子所处的历史时代.....	(1)
孔融	(11)
陈琳	(29)
王粲	(55)
徐干	(80)
阮瑀.....	(105)
应玚.....	(124)
刘桢.....	(143)
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165)

附录：

建安时期其他作家.....	(176)
祢衡.....	(176)
繁钦.....	(182)
杨修、吴质.....	(191)
蔡琰.....	(196)
丁仪、丁廙.....	(207)
建安七子年表.....	(210)
建安七子论著资料索引.....	(240)
建安七子诗歌评价.....	(253)
后记.....	(281)

建安七子所处的历史时代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建安这一历史时期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建安文学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个继往开来、成绩卓著的文学发展阶段，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光辉的一页。

在这一文学发展时期，曹操、曹丕、曹植以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才能总领风骚。同时，在他们周围簇拥着为数众多的作家，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文学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有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刘桢、应玚等，史称“建安七子”。

“七子”名称的由来，始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由于《典论·论文》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及其巨大影响，“七子”之名于是传播开来，

并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承认。但是，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对孔融是否在七子之列提出了质疑，认为孔融不应该列入。其理由大致是：首先，无论年龄、辈份，孔融不应与其他六子并列；其次，建安七子为围绕曹丕、曹植兄弟的文人集团，孔融则与邺下无缘，也绝非曹操的依附者，最后因得罪了曹操，遭到了杀身之祸。第三，就文学的风格流派，孔融也难以与其他六子相提并论。那么，曹丕为什么将孔融列入七子之列，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然而，建安七子的说法已成文学史之事实，且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不妨仍然按旧说，统而论之。

为了更好地了解建安七子的生平及其创作，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发展史，追寻他们的足迹，回顾其不平常的生活年代。

一、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

和帝以后，东汉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短暂稳定时期，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当时，政治极端黑暗、腐败，豪族地主势力迅速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同时，宦官、外戚两个政治集团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更加激烈。随后的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汉王朝在摇摇欲坠之中。

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东汉王朝政治斗争的焦点。从和帝时起，这种斗争已经开始。外戚都是出身于开国时的将相功臣之后。他们在皇帝和太后去世之后，仍掌握朝廷大权。如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窦宪身居要职，掌握了朝中的实际权力，“威震朝廷”。和帝死后，十三岁的安帝即位，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秉政。安帝死，顺帝即位后，梁氏掌政，后父梁商、兄梁冀为大将军，仅梁冀掌权达二十四年。

之久。据史书记载，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和卿相、尹相达五十七人之多。顺帝以后的冲、质、桓三位皇帝，都是梁冀所立。年幼的质帝只因说了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朝中的大小事情都由他独裁，皇帝根本无权过问，外戚专权达到了顶点。

外戚专权，无视幼主，皇帝成年以后，为了摆脱外戚势力的威胁，往往结纳自己左右的宦官，以图除掉外戚。这样，皇帝亲政，重用宦官，于是又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如和帝用宦官郑众谋除外戚窦宪；安帝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外戚阎显，拥立顺帝，被封为侯，宦官权势渐盛；到了桓帝时，其依靠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五人，铲除梁冀一门。事成以后，同日封侯，被称为“五侯”。

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争权夺势，使东汉末年的政权日渐腐朽、黑暗。不论外戚还是宦官，他们同样贪赃枉法，大量掠夺人民的钱财。如外戚梁冀秉政期间，为了狩猎取乐，竟然封禁土地达数千里作为园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殆将千里”。^①向皇帝进贡的贡品，都要先入梁府。梁冀被诛后，抄没他的家财，值钱达三十多万万，竟是东汉全盛时期全年租税的一半。

宦官的横征暴敛，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宦官侯览，“奢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②，其住宅还模仿皇宫的样式，建有楼阁、苑囿等，甚是豪华。其兄侯参，掠夺百姓的资财达几十万之多，金银锦帛达三百余车，足见其敲诈勒索之甚。

① 《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列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八《侯览列传》。

另外，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上两极分化极为严重，高官达贵穷奢极欲，而广大百姓却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安帝以后，旱灾、水灾、虫灾不断发生，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永兴元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乞道路，至有数十万户”^①。尽管如此，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并没有减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集，船车贾贩，周于四方”，这样，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更加尖锐。

同时，在宦官、外戚的斗争中，由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在起作用。宦官专权，使朝中的官僚受到排挤和压抑，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由于察举制度败坏，贿赂公行，官僚机构更加滥杂。当时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深刻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察举制度的虚伪。一些在太学中读书的太学生，因宦官把持大权，难以出任，引起他们的不满。这样，他们就和遭到排挤的官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宦官的斗争，最后终于发生了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事件以后，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到了极点。卖官鬻爵，贿赂成风，上下沆瀣一气。灵帝公开在西园卖官自肥，“二千石的官卖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卖四百万”，公、卿、州郡长官、关内侯，直到禁卫军士、羽林、虎贲等都标有定价。有些官爵，不敢公开买卖，就通过宦官及皇帝的亲信私下进行交易。这样，官吏到职后，便极力搜括民财，把买官时的钱捞回来。农民被剥削和被压榨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

^① 《后汉书·桓帝纪》。

在当时社会的诸矛盾中，民族矛盾也很尖锐。东汉统治者不仅剥削、压榨内地汉族百姓，同样，对从边境迁到内地的少数民族也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以致引起西羌人二次大规模的反抗东汉统治者的斗争。

第一次羌人大暴动发生在公元 107 年。东汉骑都尉王弘强迫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的羌人远征西域。羌人怕远戍不归，行至酒泉（今甘肃酒泉）时，遂散逃反抗，遭到官兵的堵截，并强令西征。羌人被迫发生暴动。这次暴动，持续了十二年之久，最后虽被镇压下去，但却耗费了东汉王朝军费达二十四万万之多，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第二次羌人大暴动发生于公元 140 年。顺帝永和四年（公元 139 年）并州、凉州刺史以来机、刘秉对羌人进行更为残暴的统治，激起了羌人更大规模的反抗。第二年，羌人先后攻打金城、关中、武都、陇西等，杀朝廷命官，焚烧先帝陵园等，声势极为浩大，使东汉官兵屡遭失败。第二次羌人大暴动持续了五年。

在东汉王朝对羌族长达五六十年的战争期间，耗费了大量的军费，严重地摧残了其财政。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争，使大量的士兵死亡，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歌谣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足见长期战争对农村经济破坏程度之严重。

宦官、外戚的斗争和党锢事件，使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广大农民的流亡和负担加重，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迫使他们不断地起义，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仅桓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十

四次之多。灵帝在位的十二年中，农民起义发生了六次。最后，到了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

黄巾起义终于因敌我力量悬殊和起义军自身弱点及战术上的失误而失败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火焰是扑不灭的，随后，在黄巾起义影响下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向东汉反动统治展开了一场规模壮阔的持久战，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使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二、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的大豪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使东汉末年形成的割据局面进一步明朗化了。最后，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

最初，混战是在掌握朝廷大权的董卓和以袁绍为盟主的军阀之间展开的。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朝廷大权被何太后及后兄大将军何进所把持。何进为了铲除宦官势力，联络、拉拢世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袁绍，密召驻防河东的并州牧董卓入京，企图尽诛宦官，因事泄何进被杀。袁绍起兵杀宦官两千余人。接着，董卓乘机带兵进入洛阳，另立灵帝之子刘协为帝（献帝），逼走袁绍、袁术和曹操，独揽朝廷大权。董卓当权，残暴专横，法令苛酷，纵使其军队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关东各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权，以袁绍为盟主，纷纷讨伐董卓，混战的局面形成。董卓为了逃避关东州郡军队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和陇西的联系，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挟持献帝西迁长安。他迫使洛阳一带的百姓同行，并大肆

抢掠，放火焚烧了洛阳数百里内的房屋，使洛阳附近一空如洗，其惨状目不忍睹。

初平三年（公元 192 年），董卓被部将吕布所杀。之后，军阀之间的混战在袁绍与曹操豪强势力之间展开。袁绍是东汉后期很大的一个豪族，打败了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的公孙瓒，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地区的实力最雄厚的割据势力。

曹操是北方另一个割据势力。他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收编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军的精锐队伍以后，实力大大增强。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他迎汉献帝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同时，他又采取了一些积极开明、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在许昌和其他地方设立屯田，积蓄了军资，成为足可以和袁绍抗衡的唯一力量。

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袁曹两军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曹操利用袁军的弱点，乘其不备，采取各个击破和偷袭的战术，打败了袁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官渡战后，袁军元气大伤，袁绍也在忧郁中病死。其子袁谭、袁尚互争权位，相互攻击。曹操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以后，他又出兵打败了与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为最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曹操想乘胜一鼓作气统一南方，于是便挥师南下，企图夺取刘表割据的荆州（今湖北省襄阳），然后再进占江东，达到逐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的。但是，赤壁一战，曹军大败。曹操不得不收回统一全国的念头而退回北方。从此，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不久便出现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

长达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整个北方地区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荒凉、凄惨的景象。据史料记载，仅董卓强迫百官和百姓西迁长安，把洛阳宫庙、官府、民宅全部烧毁，使昔日繁荣的洛阳，顷刻变成了“二百里内无复孑遗”的空荒区域。途中“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①，其惨状目不忍睹。关中凉州军阀混战，长安几十万人口走死逃亡，“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②。曹操与徐州牧陶谦战，操军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③，曹操“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④

军阀混战，必然造成土地的荒芜和饥馑的流行。当时甚至连割据者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食。“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⑤。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曹操部队的军粮里，也杂有人脯，以补粮食之不足。军队尚且如此，那么平民百姓之境遇更可想而知了。

三、三国鼎立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以后，统治者都想方设法安定其统治地区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力，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确保自己的统治。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③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

^④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

^⑤ 《三国志·武帝纪》。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稳定其社会秩序，促进生产的发展。在政治上，他坚持“唯才是举”、“任贤用能”，他曾先后三次下令选贤任能，鲜明地提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主张。他的不拘一格录用人才的组织路线，得到了有贤之士的拥护。此外，他严明法纪，赏罚分明，广开言路，善于采纳部下正确的意见，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有识之士，并且大胆起用一些敌对势力中投奔而来的名将谋臣。这样，为自己的政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经济上，他大力推行屯田制，结果，“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库皆满”。这样，不但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而且也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曹操还大兴水利，开渠修河。水利设施的修整和灌溉陂渠的修复、兴建，大大促进了北方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促进了曹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蜀、吴经济的发展。蜀国、吴国也相应采取了一些积极、可行的措施，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

蜀国地处巴蜀汉中，物产丰富，号称“天府”。军阀混战期间对其破坏性较小。他们仿效曹魏的做法，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制，同时兴修水利，注重维护水利设置工程。在工商业方面，积极扶植盐铁业。蜀中富有盐井，“一斛水得五斗盐”；又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①。蜀国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也很发达。左思的《蜀都赋》中描绘“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灌色江波，黄润比筒，箴金

^①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所过”，可见织锦业之发达。

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土地肥沃，是鱼米之乡。汉末中原战乱，人民大量南移，使孙吴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由于推广屯田，孙吴境内的农业经济，颇为发达。同时，孙吴的纺织业、造船业、商业、手工业等等，也相当发达。左思的《吴都赋》中对此也有描述：“其四野，则畛畝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穠秀菰穗，于是乎在。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窥东山之府，则瓊宝溢目；覩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

以上众多措施的实施，在客观上使魏、蜀、吴三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使人民在短期内免遭颠簸流离之苦而专心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以上就是建安七子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创作出许多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孔 融

孔融（公元 153—208 年），字文举，鲁国（今山东省曲阜）人，曾做过北海相，所以后人又称他为孔北海。

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在建安七子中，孔融的年辈较长。他比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大十八岁，比王粲大二十五岁，比曹操还大二岁。

孔融是东汉旧臣，不属于曹操集团。“文举自是汉臣，与王（粲）、刘（桢）辈迥异，列之邺下，其义未安。”^① 孔融生活在汉桓帝永兴元年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间。其父孔宙曾做过太山都尉。他从小聪明伶俐，“有异才”。孔融让梨的故事已家喻户晓。《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十岁的时候，孔融随其父来到京师洛阳。当时，河南尹李膺简重自居，门禁森严，除了当世名人及友好世家，其他一律不接待。孔融“欲观其人”，

^① 胡应麟《诗薮》。

于是就故意前往拜访。他对门吏说：“我是你们李家世交好友的子弟，请让我进去。”门吏将来者通报给李膺。李膺听说是“世交”朋友的子弟，便让门吏将他带来，结果一看却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便问：“你家祖父与我有旧交情吗？”孔融回答说：“是的。我的祖先是孔子，您的祖先是老子，他们彼此像师友一般交往，可见咱们孔、李两家老早就是世交之家了！”李膺听了不禁连连称赞。在座的宾客、名士也不住口夸奖。太中大夫陈炜后至，人们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陈炜说：“小时候如此，长大了未必就能出众。”孔融马上答道：“如果按您的说法，小孩子没有必要聪明了。”李膺听了大笑道：“这孩子如此聪明，将来必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李膺很高兴，让孔融落座并对他说：“你想吃点东西吗？”孔融说：“需要吃点东西。”李膺说：“我教给你作客人的礼节，当主人问你吃不吃东西时，应推让说不吃。”孔融接着说：“不能这样。我教您作主人的礼节，当你放置饮食时，没有必要问客人。”李膺感叹说：“我已经老了，看不到你的富贵了。”接着，孔融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其对答如流。

孔融十六岁的时候，上台不久的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谗言，大肆逮捕党人，李膺被打死在狱中。“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张俭是孔融哥哥孔褒的好朋友，逃到孔褒家躲避，赶巧孔褒却没有在家。张俭看孔融年纪小而没有将逃难的事情告诉他。孔融看他左右为难的样子，就说：“我哥虽然在外，我难道就不能做主吗？”于是，就让张俭在他家躲避了几天。后来事情泄漏出去，官府就将孔褒、孔融逮捕入狱。孔融说：“我把张俭保护起来，由我承担罪责。”孔褒说：“张俭来找我，不是我弟弟的过错，自然由我来抵罪。”官吏不